

从表演性理论角度探究《蝴蝶君》中的身份建构与解构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洪卓

[摘要]《蝴蝶君》以冷战时期的一位法国外交官和一位中国京剧旦角演员为主要人物,通过对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进行后殖民改写的方式探索了种族及性别身份等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该作品中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尤为值得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蝴蝶君》中两位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分析,从表演性理论的角度出发来探究《蝴蝶君》中性别以及种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关键词]蝴蝶君 表演性理论 性别身份 种族身份

《蝴蝶君》是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1986年完成的作品,于1988年进行首次公演并获得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该作品为黄哲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时代周刊》称他为阿瑟·米勒之后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他后来的作品也大都体现了其对族裔问题的思考与深切关注。《蝴蝶君》是对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东方女子刻板印象的颠覆,是对性别关系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倒置。值得注意的是,伽里玛爱上的不仅仅是他心中固有的东方女性的刻板形象,更是宋丽玲有意识的性别操演以及种族操演下所构建的虚假的东方女性身份;另外,伽里玛自身亦企图在对他的认知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身份和西方身份的反复操演中达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不无讽刺的是,当伽里玛发现他的“蝴蝶夫人”根本不是一个柔弱、需要保护的女性,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人的时候,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在狱中扮演“西方的蝴蝶夫人”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表演性理论可追溯到J·L·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言语是可以“施事的”,有些言语表达本身就是行动。女性主义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将表演性理论用于性别理论研究,强调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性别是社会的而非天生的,身体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文化和权力决定的。在其文章《表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关于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1988)中,巴特勒陈述了性别构建的过程以及各人的主体性:“身体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身份持续不断的物质化。一个人不仅拥有身体,更是在执行(do)自己的身体。”这种执行,即不断的操演,实现了一个人的文化及社会身份的构建。本文将从表演性理论的视角分析宋丽玲和伽里玛分别对性别和种族的建构与解构。

一、宋丽玲有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及其虚假身份的建构

《蝴蝶君》中宋丽玲作为间谍是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在伽里玛面前出现。为了获得伽里玛的爱慕,身为男性的他一直在有意识地通过不断的操演来构建伽里玛心目中的完美的“蝴蝶夫人”身份。他了解西方人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更深知他们钟爱“蝴蝶夫人”这部歌剧的缘由——一个柔弱无助的东方女人总是可以赢得西方人的同情并唤起其优越感。与伽里玛初遇时,宋丽玲字字铿锵:“这是一个你们最爱的幻想,对吗?顺从的东方女人和残酷的白种男人。”而再一次见面后“她”则主动邀请,语气甚至是虔诚的乞求:“我一直等到我看见太阳。我一晚上所能采取的自律,就这么多了。你原谅我了吗?”两人交往中宋丽玲不断强调并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东方方式行为准则与中国古典神秘主义色彩:“伽里玛先生,我是个中国女孩。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一方面,“她”反复声明自己憎恶被动的东方人,另一方面,“她”频频像伽里玛表露深深爱意,坦诚自己的妥协与无助。这让伽里玛深信“她”表演出的卑微,并使他开始强烈地感觉到拥有权力的快乐。“她”最终毫无原则与自尊退让,使得伽里玛高呼:我终于获得了支配一个漂亮女人的权利。宋丽玲一系列的举动恰恰迎合了伽里玛心中对东方女人的定义:她是一个柔弱无助的存在,等待着他去拯救,屈服于他所给的一切。宋丽玲通过不断有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在伽里玛面前展现了一个柔弱温婉、矜持娇羞的东方女子形象,构建了一个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虚假性别与种族身份。

二、伽里玛无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及其失败的身份建构

法国外交官伽里玛是一个充满沙文主义的强权主义崇拜者。他之所以对宋丽玲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被宋不断强化的支配欲。他喜欢《蝴蝶夫人》的原因很简单:日本艺妓秋秋桑是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的所有物。她对他无怨无悔,她会为了那个西方男人放弃一切——尊严甚至生命。伽里玛在自己所处的团体中是个被孤立者,常常受到排挤与压迫,因而他急切地想摆脱这种挫败感,渴望能成为主导者。每每在工作中以及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他就会下意识地到宋丽玲那里去寻找精神上的安慰。伽里玛的第一次性经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强奸,他对马克矢口否认自己的被动,内心则一直耿耿于怀。而瑞尼对他的性器官的讽刺更让他倍受打击。他以宋丽玲作为实验对象,把她视作一只被针刺穿心脏的蝴蝶,为的是感觉一个男人的绝对权力,操控一个女人

的权力。而宋的表现正如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唱词:“我出身于这样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卑微/谦逊而沉默”,伽里玛的愿望在宋丽玲的表演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同时他也在一次次欲罢不能的对权力的渴望中乐此不疲地操演着自己心中的西方霸权角色,并试图从这种操演中建构自我男子气概以及强者身份。在巴黎,伽里玛再次感受到了权力:“我本来可以把身无分文的你放在巴黎的街道上!但是,我收留了你!”在宋丽玲面前,他扮作一个救世主、一个君王,让“她”屈服于他的脚下。不同于宋丽玲,伽里玛的操演是潜意识支配下的对权力的渴望造成的,他的反复操演使其种族优越意识不断被内化。然而,他的身份构建是失败的,自始至终,他都没能成为为一个控制者,而是反被控制住了。他一直沉浸于一个虚幻的假想中,不能也不想走出来。

三、宋丽玲对女性及东方身份的解构

女性常常被人看作是弱者的代名词,而东方也被西方人认为是女性化的。剧中伽里玛的朋友马克曾对他谈及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这是个古老的故事。他深埋在我们的血液中。他们害怕我们,瑞尼。他们的女人害怕我们——他们的男人恨我们。”显然,这个“古老的故事”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是失真的,只是西方人自己一厢情愿的刻板印象。最终宋丽玲在面法官的审问的时候就直言:“西方认为他自己是男性化的——有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还有大笔的钞票——所以,东方是女性化的——软弱,精致,贫穷……但是精于艺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些都是女性的神秘特质……在内心深处,西方相信,东方想要被统治,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自己思考。”当宋丽玲以一个男人的身份站在伽里玛面前,脱光了衣服问伽里玛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伽里玛不愿承认地说“一个——一个男人”。而从之前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得知事实上后来的每天晚上宋丽玲都说要脱光衣服,而伽里玛此时就会请求他停下来。很明显,事实真相伽里玛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他不愿从自我陶醉的迷梦中醒来罢了。宋丽玲展示出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强大的男人身份。戏剧最后宋丽玲与伽里玛的对话满是讽刺,是对西方支配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化观念的一种反抗与解构。

四、伽里玛对男性及西方身份的解构

伽里玛的操演是已经内化了的信念的指使,是他信以为真的东西,他深信自己该是一个强者。公开地,他还是继续否认宋丽玲是个男人。而独自一人的时候,在他的牢房,他早已正视了现实。最终,他还是没能成为他渴望成为的君主,而是带上蝴蝶的假发,穿上和服,说着蝴蝶的话——“死于贞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好——他最终选择切腹自杀。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名字叫伽里玛——同样作为蝴蝶夫人而广为人知。”最后,伽里玛以表演的形式解构了西方的霸主身份,也解构了男女、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身份——东方不再是柔弱、依附于强者的女性的刻板形象,西方也不再是意味着权利的男性刻板形象。

五、结语

如巴特勒所说,“一个人不仅拥有身体,更是在执行(do)自己的身体。”这种执行,即不断的操演,完成了宋丽玲以及伽里玛文化及社会身份的构建。宋丽玲的表演中角色身份的转变使其实现了对男女、东西方绝对的二元对立思想的有力反拨,并完成了自我身份构建;而伽里玛对自认为的男性以及西方身份的反复操演是建立在他的男性至上、西方霸权的错误理论基础上的,这也就注定了他身份建构的失败。

参考文献

- [1] J·L·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2] Judith Butler. Performative Acts and Gender Constitution [M]. Fortworth: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1995
- [3] 陆俊. 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 武汉: 外国文学研究, 2003(3)
- [4] 普契尼. 蝴蝶夫人[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3
- [5] 王璐. 解构视角下的《蝴蝶君》[J]. 域外视野, 2005(2): 86-89